



eCOMMONS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Loyola eCommons

History: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Other Works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Other Works by
Department

3-2018

A Midwesterner's Reflections on Teaching Public History in China

Theodore J. Karamanski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tkarama@luc.ed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ecommons.luc.edu/history_facpubs



Part of the [History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Karamanski, Theodore J.. A Midwesterner's Reflections on Teaching Public History in China. *Public History: A 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History (China)*, , : 232-242, 2018. Retrieved from Loyola eCommons, History: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Other Works,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Other Works by Department at Loyola eCommons.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History: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Other Work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Loyola eComm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ecommons@luc.edu.

© Theodore J. Karamanski 2018

关于中国公众史学的反思：来自美国中西部的视角

西奥多·卡拉曼斯基 (Theodore J. Karamanski)*

2015年7月，我来到重庆大学，参加由李娜研究员主持的“第二届中国公众（公共）史学高校师资培训”。面对着来自中国不同高校的历史教师和研究者，我尝试着解释什么是公众史学及其在美国是如何实践的。我发现这其中挑战重重，语言的障碍只是其中之一；更大的挑战在于，中国文化可上溯至公元前1600—前1046年的商朝，这不仅超过了相对年轻的美国，而且比所有的西方文明都更古老。面对这些参加培训的教师，接受过不同历史训练且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我不知道自己的经验是否有所帮助。不过，对于来自某些资深历史教授对公众史学的种种质疑，我倒是有所准备。毕竟，这是在过去的40年里我在美国一直试图克服的偏见。

这次重庆之行，我受益匪浅。我最深的感受是将公众史学带入中国需要克服的远远不止语言障碍。当谈及历史保护的问题时，政府在两种文化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中国，政府在土地管理方面有较强的控制力；而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当地政府为历史保护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但个人或社区组织也参与

* 西奥多·卡拉曼斯基 (Theodore J. Karamanski)：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历史系教授，公众史学项目负责人，美国公众史学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前任主席 (1989—1990)。他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公众史学的伦理规范并起草撰写了《美国公众史学委员会之伦理规范与行为准则》，并于1991年出版了《伦理与公众史学》(Ethics and Public History: An Anthology) 一书。他担任美国国家公园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历史频道 (History Channel) 和旅游频道 (the Travel Channel) 等的遗产专家顾问，是芝加哥海洋博物馆的创建人之一。他的公众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大湖区域的文化资源管理、环境历史和美国印第安人的权利等，专著包括：《毛皮贸易与探索》(Fur Trade and Exploration, 1983)，《森林深处：密歇根州北部的伐木历史》(Deep Woods Frontier: A History of Logging in Northern Michigan, 1990) 等。

国中西部的视角

Theodore J. Karamans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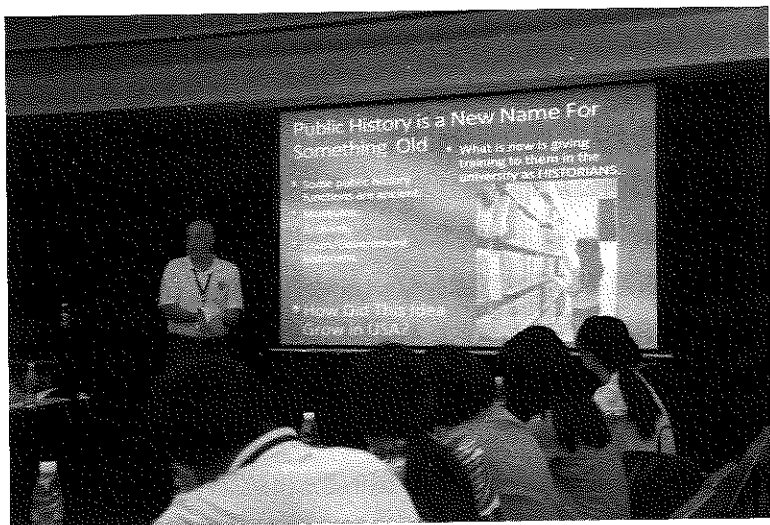
研究员主持的“第二届中国公
同高校的历史教师和研究
可实践的。我发现这其中挑
手，中国文化可上溯至公元
论的美国，而且比所有的西
过不同历史训练且有着源远
功。不过，对于来自某些资
者。毕竟，这是在过去的 40

将公众史学带入中国需要
时，政府在两种文化中扮演
的控制力；而在美国，联邦
但个人或社区组织也参与

哥洛拉大学 (Loyola University
史学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n
代倡导公众史学的伦理规范并起
并于 1991 年出版了《伦理与公众
任美国国家公园局 (National Park
道 (History Channel) 和旅游频道
馆的创建人之一。他的公众史学
国印第安人的权利等，专著包括：
林深处：密歇根州北部的伐木历史》
m,1990) 等。

甚至主导历史保护。因此，我的历史保护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同人未必有太大用处。除了历史保护，公众史学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唯有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地路径才能使得公众史学得到长足发展。

不过，在创建公众史学项目的过程中，西方的经验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在重庆的讲座里，我解释道，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们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创建公众史学项目，其成功的秘诀在于：一、项目为芝加哥——美国中西部的大都会城市——的城市环境、公民资源和社区需要量身定制；二、项目遵循学校的理念和使命。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这意味着符合天主教耶稣会传统，相信社会公正，并通过教育鼓励学生超越知识进入反思性实践，公众史学项目的设置需要与之契合。在美国的公众史学项目，基本的课程大同小异，但综观全国优秀的项目，它们大多服务于所在的特定地域。



西奥多·卡拉曼斯基在第二届中国公众（公共）史学高校师资培训班授课，2015 年 7 月。图片来源：李娜

公众史学实践的伦理问题也是值得在跨文化语境中分享的。公众史学在美国起源时学院里的历史学家忧心忡忡，质疑在学院之外的史学实践会将公众史学家变为某一方利益的倡导者甚至沦为雇用者工具。为了打消这些疑虑，我于 1986 年参与制定了美国公众史学委员会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的伦理规范 (Code of Ethics)。这是历史行业的第一部伦理规范。美国公众史学委员会于 2007 年对此进行了修订和增补。准则的核心内容是公众史学家服务于公众利益。我们的研究与证据分析之方法与学院内的历史学家并无两样, 但我们的研究具有特殊性和实践性, 为公众所用。伦理规范为学生树立了职业行为的标杆。

而在关于公众史学伦理问题的讨论中常常缺失是并不是对职业伦理的威胁, 而是个人伦理所面临的挑战, 需要做出的艰难选择。我在重庆的师资培训中谈到了我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课堂常常引用的一个案例。该案例讲的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受雇于房地产开发商, 负责研究某一街区, 并准备历史登录的相应文本。当地居民对此抗议, 因为他们认为登录成为历史街区将导致该街区中产阶级化, 从而租金上升, 居民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自己的家园。而另一方面, 历史登录能保护这一街区的历史建筑, 免被拆毁或废弃。于是, 保护街区里低收入人群居住的权益与通过历史保护将建筑改为他用之间均存有公众利益。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情形, 与很多公众史学项目类似, 不是职业伦理的问题, 而是个人伦理的两难处境。

在美国, 优秀的公众史学项目培养学会生成为我们所说的“反思型实践者”(reflective practitioner), 即成为对在公众领域工作所面临的种种不可避免的矛盾和争议有所准备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对不同文化, 无论是亚洲、欧洲还是美洲的公众史学家而言是共通的。我们所工作的文化、政治或国家的大环境可能各具特色, 但在将历史服务于公众利益上, 我们的目标和理念是一致的。在中国教授公众史学的短暂经历给我以下几点启发。一是笑话往往很难跨越文化。我觉得妙趣横生的逸闻趣事, 而中国的教授们却熟视无睹, 一脸正经。不过我发现当历史学家在中国发展公众史学所遭遇的种种质疑与这一学科在美国起源时我们所面临的情形极为相似。即使在 40 年后的今天, 公众史学也没有在等级森严的美国历史学界得到完全接受。不过,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们的工作有价值, 而且我们为能有机会从事公众史学而愉快。将要出版的《公众史学》便是最好的证明: 中国的公众史学家们正在努力探索一新兴领域。我对中国的公众史学如何发展, 以及我们的公众史学共同体如何借鉴中国经验很感兴趣, 并充满期待。

历史在我们身边

李娜

由于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冲击，历史知识的载体和传播平台在信息时代日益多元化。公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接触到大量的历史信息，开始更批判地解释、分析并传播这些信息，开始质疑并挑战一直以来的历史与话语权。同时，公众对历史内容的需求也急剧上升，学院与公众的距离逐渐缩小，历史开始回归公众。一方面，历史不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文字也不再是历史表述的唯一媒介。另一方面，公众与学者对历史的关注似乎有所不同。学院之外的历史更生动活泼，影响力更为广泛。

尽管公众史学的实践已经走在理论的前面，但是，在参与公众史学的各种力量中，历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依然应该承担最主要的责任。为什么？美国公众史学的先驱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教授在1978年曾指出：“只有那些没有急迫的生存压力或直接利益驱动的人才能真正承担发展这一学科（公众史学）的责任，因为只有这些人，才能从长远考虑社会意义与价值，才会思索公众的利益与需求，这些人便是大学里已获得终身制的教授们。”^[1]对公众史学刚刚起步的中国，凯利教授的洞见依然具有借鉴意义。公众史学若要持续地发展，它需要厘清与各相关学科或领域的关系，需要从纷繁复杂的实践中反思，需要提炼各种实践的内在逻辑关系，需要建构基于这些实践和反思的理论框架，需要严谨的研究方法，需要伦理道德准则以保证其客观与公正的诉求，需要一套完整、成熟的教育体系，需要一个以“共享权威”为核心的共同体，否则就会和很多从其他国家引进的学科一样，在中国的土壤里无法生根，只能是“昙花一现”。^[2]公众史学需要根植于学院，需要以开放的心态持续不断地与实践对话，而高校历史教师责无旁贷。

同时,公众史学在不同国家遵循着不同的发展路径与模式,这一领域的一些核心理念虽然可以跨越文化,对我们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但是,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过去40多年有序开展的公众史学运动相比,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语境和与之呼应的历史实践,如民间博物馆、公民记忆计划、中学生写历史、百家讲坛、家族历史等。因此,我们需要“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国内已有部分历史学家、历史教育者、历史机构的实践者以及传媒界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公众史学,开展跨学科合作,共同拓展这一领域。2014年7月18日至22日,“首届中国公众史学高校师资培训”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公众史学由此进入高校历史教育。^[3]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开设公众史学的相关课程,一些教师开始公众史学的实践,同时,更多的高校有开设公众史学课程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7月10日至22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了“第二届中国公众(公共)史学高校师资培训”(以下简称“培训”)。^[4](插图一)来自全国18所高校和4家历史机构的22名学员参加了这次培训。^[5]

与首届培训相比,第二届培训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培训的主题是城市公众史学(urban public history),即发生在城市空间的公众历史,通过现代城市空间的激进性、反叛性与制度化的历史呈现等特征将公众史学本地化(localize)和情境化(contextualize),并通过讲座、研讨、工作坊和实地参访结合的形式展开。首先,注重使用本地城市历史资源,结合公众史学与重庆史研究。实地参访包括重庆市区主要的公众历史场所,如史迪威博物馆、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湖广会馆等。其次,充分发挥本地学者的专业优势,探索公众史学与历史保护、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本地史、媒体等领域之间的关系。一位学员写道:“何蜀、吕岱、何智亚、敖依昌等诸位重庆本土学者各有专长,他们在口述史、博物馆、城市史、文化遗产、纪录片等领域的理论探索与个案实践极具示范效应,并且能够结合各自实践中遭遇到的难题,和学员分享经验教训。”^[6]

二、关于“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专题,培训增加了实践环节。印第安纳普渡大学(Indiana University/Purdue University, Indianapolis, IUPUI)的菲

模式，这一领域的一
，但是，与美国、英
运动相比，中国有着
馆、公民记忆计划、
“中国特色”的公众
实践者以及传媒界专
一领域。2014年7月
师范大学举行，公众
众史学的相关课程，
公众史学课程的迫切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
培训”（以下简称“培
22名学员参加了这

），即发生在城市空
度化的历史呈现等特
并通过讲座、研讨、
城市历史资源，结合
众历史场所，如史迪
馆、重庆市档案馆、
充分发挥本地学者
、图书馆、本地史、
智亚、敖依昌等诸位
文化遗产、纪录片
各自实践中遭遇到

实践环节。印第安
opolis, IUPUI) 的菲

利普·斯卡皮诺 (Philip Scarpino) 教授的“口述历史方法与实践” (Practical Aspects of Doing Oral History) 工作坊系统讲述了口述历史实践的规范性，其中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实践的原则和最佳模式，以及口述历史项目的主要步骤，包括目标、资金、知情同意书 (Informed Consent)、使用协议 (Agreement on Use)、访谈提纲、提问技巧、逐字稿翻译、访谈资料的存贮等。大部分学员受益匪浅：“虽然好几个老师都说到了口述史，但我觉得菲利着的讲述最为系统、最为实用、最为科学：从基本原则、采访前的准备、如何提问题、如何修改及存档、伦理与规范、知情权、使用权等等。”“菲利着教授治学严谨，为学员准备了许多重要的资料，并且能够紧密结合口述史项目实践，让学员真正把握‘什么是规范的口述历史’、‘如何做口述史’、‘口述史应当遵循什么样的道德伦理’等核心议题。”“菲利着教授的‘口述历史的实践与反思’给我做了很好的伦理指导和操作示范。菲利着列出了他主持的一个项目的知情同意书、使用协议、项目草案，非常详尽，以后可在田野中模仿使用，很感谢他的无私共享。”

三、历史走向公众，也常常意味着走向市场。针对历史商业化以及历史学家如何处理职业操守和客户利益之间的矛盾，培训增加了“公众史学与伦理道德”板块。如果客户需求和我们的研究使命相悖，该怎么办？客户的商业利益与客观公正的研究之间是否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谁掌控着委托历史项目的最终命运？历史学家对他们的客户和所任职的机构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归根结底，为什么伦理道德是公众史学项目的核心？^[7]

与伦理道德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目前在中国十分流行的网络写史，或学术界所言的“数字历史”。这种由于数字媒体兴起而产生的历史写作是否是一种“历史”？毫无疑问，信息时代的公众拥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与过去近距离接触：各种历史信息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公众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意味着历史知识与信息的民主化。但无论何种途径，历史的生产 and 撰写都包括数据收集，对数据的批判，以可读的方式解释、呈现事实，并作出结论^[8]，三步缺一不可。这样的过程需要经过最严格的、缜密的检验。^[9]当公众带着个人感情解释、处理这些复杂纷繁的信息时，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批判性思维和评价。“论断”与“事实”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仅仅“复制—剪切—粘贴式”地处理信息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其次，大众写史也许是公众参与历史的一种方式，应该

鼓励,不过,未经训练的写作往往对内容不够负责,对非常规的史料(主要是书面材料之外的)运用不够严肃,忽略版权,这都会导致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如果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不断互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不断对话的过程^[10],那么伦理道德准则是对史料、对受众、对过去和未来、对普通公众负责的保证。这一过程需要“共享权威”,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因该放弃职业素养、准则和规范,只为迎合公众的需求。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的西奥多·卡拉曼斯基(Theodore Karamanski)教授是美国公众史学界最早提出并倡导公众史学与伦理道德的先驱之一,他指出历史的道德目标是发掘真实的过去,并由此倡导一种更高尚、更宽广的责任感、服务理念和社会职能,尤其是对公众的责任感。^[11]卡拉曼斯基教授通过不同公众史学项目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人和事件所承担的伦理责任,生物史的伦理道德,历史街区的登录中“绅士化”等,深入分析了公众史学家通过服务客户而盈利,并不一定意味着“不符合历史的伦理道德准则”。同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犯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道德。若是因为信息不足,做出错误的历史判断,则不属于不道德行为。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市场经济注定会影响甚至操纵公众史学项目,因此,厘清其中的伦理道德线索,维持学者求真的职业操守显得尤为重要。

四、目前,公众史学在很多国家里都积极地借助各种媒体,将历史分析与评论融入各种形式的大众传媒,历史呈现方式逐渐走向多元。今天,公众能自由平等地使用数字档案,改变了学院对历史解释和传播的长期垄断,而视觉手法也不再是一种装饰噱头,它引入的是另一种历史叙事,进而激起公众反馈、评论、想象与反思,“历史不仅为理性所认知,也充满诗性”^[12]。因此,培训强化了历史与各种媒体的关系以及历史的媒体呈现。重庆的资深媒体人吕岱先生分享了纪录片制作中如何探索历史的真实性与复杂性,以及在这个读图的时代,如何通过平行蒙太奇、情景再现、抒情和叙事的方式将历史的细节呈现给公众。浙江大学的陈新教授从历史哲学层面分析了新媒体的出现是中国公众史学发展的机遇,并探讨了大数据时代下历史研究的契机。北京大学的赵冬梅教授题为《史学的专业门槛与公共传播》的讲座则是专业史学者介入媒体,传播历史知识的实践。可见,史学界已经开始介入公众史学,不过由于对“公众”

常规的史料（主要是
一系列伦理道德问题。
在与过去不断对话的
未来、对普通公众负
历史学家因该放弃职
西奥多·卡拉曼斯基
并倡导公众史学与伦
过去，并由此倡导一
对公众的责任感。^[11]
题，如历史学家对过
史街区的登录中“绅
并不一定意味着“不
犯错误，但这并不意
则不属于不道德行
公众史学项目，因此，
尤为重要。

媒体，将历史分析与
元。今天，公众能自
长期垄断，而视觉手
进而激起公众反馈、
性”^[12]。因此，培训
的资深媒体人吕岱先
以及在这个读图的时
将历史的细节呈现给
的出现是中国公众史
北京大学的赵冬梅教
学者介入媒体，传播
不过由于对“公众”

的理解各有千秋，各自的“史观”也有所不同，对当前媒体带来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了解不一，学员对这三个板块的反思也有所不同。^[13]

五、专家走入课堂，教授走出学院。历史在学院内外有着不同的表述和呈现方式。传统史学者写作模式、语言、逻辑往往受学院训练的熏陶，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受众通常局限在学院内。而公众史学家是任务导向型，他们的研究成果旨在公众，他们希望能影响更广范围的人群，他们更富有创意地让历史走向公众。事实上，以各种形式代代积累的历史研究成果还没有真正进入公众领域，而一个社会的历史感知或历史认识并不完全建立在对历史的学术研究上。较职业历史学家，公众史学家更能影响公众的历史感知，更具备某种社会责任。培训中“公众史学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历史的媒体呈现”分别由这两个领域的专家何智亚先生和吕岱先生主讲，相关的实地参访也分别是两位的实践成果。另一方面，重庆大学的熬依昌教授20余年致力于史迪威研究，他对史迪威博物馆的讲述不仅体现了史学的严谨，也生动地再现了这段的历史对重庆城市发展的特殊意义。一位学员评价说：“印象最深的是熬依昌教授。（他）熟谙历史掌故，将讲解对象之于宏观历史背景之中，道出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见其价值。”

六、跨文化的学习与交流。公众史学在过去十年开始逐渐国际化，这是在中国发展这一学科的机遇。培训邀请了三位来自美国的资深公众史学教授分享他们的经验。三位教授有不同的专业领域和技能，如环境史、考古与历史保护以及博物馆学，其中两位自1980年初美国公众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NCPH）成立之初起便一直致力于公众史学的发展。同时，他们也是各自学校公众史学项目负责人，代表了美国高校公众史学项目的不同地域和文化特色，在项目设置和管理、教学模式、人才培养路径方面各有千秋，对国内高校设立公众史学项目提供了不同借鉴模式。印第安纳普渡大学的公众史学项目自1986年起一直坚持为学生提供有偿实习（paid internship）的机会，斯卡皮诺教授将服务的理念贯穿其中，与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社区、历史机构和组织建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关系。卡拉曼斯基教授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主要以芝加哥市为研究场所，带领学生参与本地的历史保护项目。通过一系列案例，他分析了历史学家在历史保护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培养学生成为历

史保护人士。由于故事将实物、建筑、地域等置于历史长河中，通过讲故事或叙事的方式，历史保护成为公众历史。南卡罗来纳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的公众史学项目以国际合作见长，埃里森·玛希 (Allison Marsh) 教授通过英国的实地考察项目 (England Field School)、关塔那摩公众记忆项目 (Guantanamo Public Memory Project)、国际实习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等探讨了国际项目合作的经验和包括资金保障、语言文化差异、时差、政府或相关机构的行政干预等各种挑战。由此，玛希教授总结了项目合作的最佳实践模式和步骤——预规划 (preplanning)、规划 (planning)、实施 (implementation)、评估 (evaluation) 和出版 (publication)。由于首届培训存在语言与沟通的障碍，使得部分课堂交流无法深入，因此第二届培训涉及的英文讲座和研讨均安排了即席翻译，学员的反响普遍较好。

七、培训的讨论较首届培训更深入，争论更激烈，尤其是关于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如何与早已自成一体的文博专业结合，以及公众史学的“传统”就业领域如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和各地历史机构等在国内属于“事业编制”的讨论，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认为以下三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培训读本。结合培训内容，读本分为公众史学的建构 (Making Public History)、过去在空间的呈现与保护 (Presenting & Preserving the Past in Place and Space)、公众史学与伦理道德 (Public History and Ethics)、公众史学与口述历史 (Public History and Oral History)、国际项目合作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和公众史学教育 (Teaching Public History) 六个部分。一方面，读本编辑了公众史学领域的一些经典文章，培训开始前一周发给学员，这样，大家有机会在培训前对公众史学做初步的了解。另一方面，读本也收入了部分授课教授推荐的文章，多与授课内容相关，提高了学员听课的效率。二是请学员针对各自所在高校的体制、文化、学科设置、资金条件等，设计与公众史学相关的课程，这样学员在“公众史学入门课程教学方案”的讨论中有所准备，有的放矢。三是请学员思考公众史学与各自研究领域和学科的关系，提交论文 (或论文大纲)。无论通过教案还是文章，通过工作坊或圆桌讨论的形式，学员均有机会与同人交流，以加深对公众史学的理解。

另外，师资培训的目的之一是要建立一个公众史学共同体 (public history

community), 两届培训的互动与交流十分重要。今年的培训特地邀请了参与去年培训的学员来讲述自己的经验和困惑。苏州科技学院的张笑川教授分享了他自去年培训结束后在浒墅关镇公众史学实践的经验 and 困惑, 探讨了历史学家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形式、口述历史、历史写作模式以及学术研究与为公众服务结合等问题。他提出是否能将“历史作为一门生意”, 激发了学员的热烈讨论。这恰恰体现了公众史学的核心魅力——共享权威——“对于一个新兴领域而言, 这样的群体思索和坦诚对话尤为重要。”^[1]

总之, 公众史学开始在中国“落地”。培训进一步推动了公众史学的发展, 促使我们以新的方式思索“历史话语权”和“历史感知”等重要课题。这既是历史的求真实践, 也是历史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二届中国公众(公共)史学高校师资培训班,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图片来源: 李娜

注释

[1] Robert Kelley, "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1, no.1,

1978, pp.16-28.

- [2] 和欧洲的学术传统类似, 中国学术界对新兴领域或学科首先需要理论和方法, 其次才是实践。
- [3] 关于首届培训的述评, 参见: 李娜:《跨文化视野下的公众史学——中国首届公众史学高校师资培训》,《世界历史评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辑,第233-257页。
- [4]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中心的王希教授对培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 [5] 参加今年培训的学员的专业背景较去年广,除了历史学外,还有博物馆学、考古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除了高校教师,另外还有4名公众史学的实践人士参与了培训。
- [6] 培训结束一周后,笔者将对本次培训评估的7个问题发给学员,21名学员回复了邮件,笔者得到准许引用这些反馈意见和建议。在引用时,笔者尽量忠实原文,同时隐去了真实姓名。
- [7] 在美国,与公众史学相关的领域早已建立了各自的伦理道德标准。美国博物馆协会早在1925年就颁布了其伦理道德标准;口述历史协会于1968年颁布了一系列伦理道德的指导性目标文件,或称为Wingspread报告,职业考古学者学会于1981年通过了其伦理道德准则。美国公众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NCPH)于1984年设立了“伦理道德委员会”,并于1985年拟定了“历史学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后来逐步修改成为公众史学家实践的指导。
- [8] Homer Carey Hockett, *The Critical Method i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Writing*,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5, pp.9-10.
- [9] Abid, pp. 5.
- [10] Edward Hallett Carr, *What is History?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ectur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1, p.35.
- [11] Theodore J Karamanski and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U.S.). *Ethics and Public History: An Anthology*, Krieger Pub Co., 1990, p.10.
- [12] Simon Schama, “All Our Yesterdays.” in David Cannadine, *History and the Media*.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20-33.
- [13] 关于不同的反思,与陈新教授的交流给笔者很大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 [14] 四篇来自第二届培训的文章作为专栏刊登,是跨学科的对话与思索的成果。见:“公众史学与文化遗产研究”专栏,《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4月,第27卷第2期,第1-22页。